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理论创新点研究

钟枢 著

群众出版社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理论创新点研究

钟毅 著

群众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理论创新点研究

钟 枢 著

.. 849
Z 733

群众出版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邓小平理论创新点研究
钟枢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7
ISBN 7-5014-3242-2

I. 马… II. 钟… III. 邓小平理论—研究
IV. 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1562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理论创新点研究

著 者: 钟 枢
责任编辑: 张忠华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698 千字
印 张: 25.25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7-5014-3242-2/A·6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

张国林

在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国家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之路。他的辉煌的思想 and 理论，他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所做出的巨大的创造性的贡献，必将使他彪炳史册，永垂不朽。大凡一个人有两种情况可以永垂不朽：一种情况，一个凡人终其一生为人民做好事，即使他死了，人们仍然会记住他，以他为榜样，他将永垂不朽，比如，雷锋、孔繁森、任长霞；一种情况，一个不凡之人终其一生进行思想、理论、实践的创造与创新，并通过这种创造与创新，为国家带来了强盛，为人民带来了幸福，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人也必将永垂不朽，比如，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七年了，但他必将像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创立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一样永垂不朽，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如果说，邓小平同志是新时代最伟大的领袖，那么，邓小平理论则是新时期最辉煌的理论。这个以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为特点，以重行动、重实效、求发展为特色的理论，承继华夏五千年文明，传承、发展、创新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为开创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尽管邓小平同志生命已经不在，邓小平理论却必将永放光芒。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富于创新精神的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邓小平理论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典范，是指引中国人民迈向 21 世纪的明灯。如果说，邓小平同志是为我党扭转乾坤的伟大领袖，那么，邓小平理论则是为人民带来福祉的辉煌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承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等，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的建立。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和不断地深入研究的科学体系。

2004 年 8 月 22 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

大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意义。饮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邓小平。当中国人民享受着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剧增的幸福生活的时候，无不从内心深处感谢这位世纪伟人，感谢他的使人民富裕、使国家强盛、使民族兴旺的伟大理论。因为载入宪法的作为立国之本的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经济，而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裕，现代化建设使国家强盛，发展经济使民族兴旺。正是凭借这个理论，邓小平同志承先启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继往开来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如果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们党的干部为实现邓小平同志遗愿的最好的实际行动，那么，对邓小平理论的大力宣传和深入研究，则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是对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最好的纪念。邓小平理论是为宪法所确认的立国之本。它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创新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条红线，没有思想的创新就没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的一生是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一生。无论是思想、理论或是实践，邓小平同志总是在创新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进行创新。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做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创新。因此，对邓小平理论创新点进行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作为研究邓小平理论创新点的学术专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邓小平理论创新点研究》一书，从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点的角度，在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法制思想、科技和教育思想、军事和国防思想、外交及国际战略思想、文化思想等八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细致的扫描和深入的研究，是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的努力和探索，也是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献礼之作。该书的作者系我校教师，是默默耕耘在思想、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员。中共西南政法大学委员会把对作者的这项校级重点课题研究的关心和支持，作为纪念世纪伟人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的一项重要内

容。作者在写作该书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大胆的探索；该书的出版得到了有关领导和部门的肯定、关心和支持。感谢中共重庆市委黄镇东书记对该项课题研究成果的重视和肯定；感谢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周勇副部长在百忙中亲自主持对该书的审阅；感谢群众出版社对出版该书的高度重视；也感谢作者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衷心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问世。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一定会沿着邓小平同志所预定的方向走下去，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其所设定的小康社会目标；理论工作战线也一定将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结出更多、更大的思想、理论研究之硕果。

是为序。

2004年7月10日，序于重庆歌乐山下

邓小平理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代前言)

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批判的。作为人类文化的精华和时代精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具有创新的本质特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之奥秘所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表明，什么时候坚持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会得到生机勃勃的发展；什么时候因循守旧，走入“凡是论”和“顶峰论”一类的教条主义的死胡同，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滞发展甚至出现倒退，就没有了生机。没有创新，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产生，也不能发展；没有重大创新，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发展。没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创新，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提炼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的三个活的灵魂，从而把马列主义发展为毛泽东思想。同样，没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重大创新，就不会有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指导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重大创新。他从当代中国和当今时代的实际出发，以批判和否定“凡是论”为思想起点，既坚持“老祖宗”（马克思主义），又发展“老祖宗”，从而在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完善和发展了邓小平理

论。他以这个理论作指导，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就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30 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1938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它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②在此，毛泽东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的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即“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11～11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毛泽东著：《论新阶段》，载延安《解放》，1938（57），36～37 页。

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按照中国特点加以具体运用的马克思主义，而“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揭示了科学理论本身包含的抽象和具体的对立面统一，也就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次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因为离开了这点，就是“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各国人民斗争时所具有的国际化（世界性）和民族化的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属于全人类，特别是属于全世界无产者，这是它的国际性、世界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必须通过与各国、各民族的具体情况结合，使其真理性内容通过民族形式表现出来。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是指“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这就意味着“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是通过“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的过程来完成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和创新来实现的。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关键在于应用，应用到中国这一“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用它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要运用得好就必须从中国特点、中国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去应用，必然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创新是成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和标志。毛泽东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就是它的革命性和实践性，它要求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按照中国特点来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改造世界），使马克思主义在改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①他提出：“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②所谓“创造些新的东西”，就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依据，就是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是事物的抽象和具体、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而是为了“提高”其理论指导，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新的理论。这才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质内容。只有既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又对中国实际经验进行系统理论思考和总结，才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即创造出新的理论。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并“按照中国特点来应用它”，就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提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归结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实事求是，是他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最突出的思想和理论贡献。由此揭示出理论是否与实际结合，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归根结底是认识路线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一个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毛泽东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

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马克思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同上书，381页。

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是贯穿于两者的一根红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有两次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飞跃。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那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则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

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努力探索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之路，力图解决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 1957 年后长期存在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左”的错误表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怎样运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中国国情出发，究竟应确立什么样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的中心是，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邓小平理论的中心，就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第二次飞跃不仅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还必须着重和首先回答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飞跃较之第一次飞跃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

1978 年底，通过反对“两个凡是”，提倡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特别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新时期的“宣言书”中，邓小平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82 年 9 月 1 日，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

平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这一“基本结论”，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这一“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基点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发展和创新。

第一，邓小平明确提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作为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出发点、立足点以及努力的目标，这就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980年，邓小平说：“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② 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提出“走自己的道路”，更为明确地把“走自己的道路”与“相结合”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这一观点表明，“相结合”的根本目的和产生历史性飞跃的检验标准，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找到一条革命或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来衡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否真正“结合”，是否“结合得非常好”，也要看是否“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道路”。邓小平反复强调新时期的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1984年，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1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①1985年，他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③1987年，他又指出：“毛泽东同志确实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得非常好，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④在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后，邓小平说：“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⑤他曾对来访的匈牙利客人说，“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⑥邓小平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与创新。

第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自己的路”的科学阐明，也是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同上书，135页。

③ 同上书，197页。

④ 同上书，254页。

⑤ 同上书，255页。

⑥ 同上书，256页。

义中国化的必然逻辑结论。毛泽东当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化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则化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4年，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一脉相承。邓小平将这两者相提并论表明，前者是后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第三，邓小平不仅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最佳结合点，而且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对于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的一个重大的历史功绩。1980年，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②1984年，他又说：“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③这就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全面概括和表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历史贡献。他不仅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对这一路线作了重大发展。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解放思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他说：“解放思想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④“我讲的是真正解放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2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才提出新的正确政策。”^①“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才明确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②他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一切实际问题，“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③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某些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④

第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时，着重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⑤“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⑥“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23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② 同上书，28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⑤ 同上书，291页。

⑥ 同上书，63页。